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外文期刊采访工作及其影响*

齐东峰　张　玮

摘　要　国立北平图书馆自其前身京师图书馆建馆初期产生了期刊馆藏建设的意识之后,便努力通过采购、征集捐赠、交换等各种采访渠道获取各专业领域的外文期刊,并逐步地树立起注重期刊完整性、辅助科学之研究的采访方针;馆藏数量也从无到有,直至民国末期的两千余种。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已开始注重北平地区外文期刊的共建共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诸多高校及研究机构南迁,所需研究资料无以为继,国立北平图书馆订购的外文期刊在此期间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表2。参考文献34。

关键词　国立北平图书馆　外文期刊采访　民国时期

Foreign Periodicals Acquisition in the National Peiping Library and its Influence

Qi Dongfeng　Zhang Wei

Abstract: Since the awareness of periodical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arising when the National Peiping Library was newly founded, it had increasingly developed its foreign periodical collection through various acquisition ways including purchase, receiving donation, and publication exchange, and gradually built up the acquisition policy of laying emphasis on integrity of periodicals and offering help to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quantity of collections grew out of nothing, and increased to more than 2000 till the last phase of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at is more valuable is that, the National Peiping Library also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foreign language periodicals among libraries in Peiping that time. After the outbreak of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many universities in North China moved southward. The foreign periodical collection in the National Peiping Library ha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at period, as most universities' subscription of foreign periodicals was ceased. 2 tabs. 34 refs.

Keywords: National Peiping Library; Foreign Periodicals Acquisitio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创建于1909年9月9日,1925年11月更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1926年3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称"中基会")因民国教育部无法履约与其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而自办"北京图书馆";1928年10月,"国立京师图书馆"改称"北平图书馆",中基会独办背景下的图书馆改称"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年6月,"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组成"国立北平图书馆"[1](19, 55-61, 74-75, 92-95)。本文整理与研究了该馆自1909年建馆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四十年间的外文期刊馆藏建设史料。在这动荡不安的40年中,该图书馆的外文文献资源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调拨征集到直接向国外订购[2],从服务本馆用户到抗日战争时期服务南迁各高校及科研机构,为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尤其在外文期刊方面,虽历经坎坷,但其馆藏建设方针和文献来源之脉络仍

* 本文系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项目"国家图书馆外文文献资源建设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NLC-GS-2014016)阶段性成果之一。

有迹可循且脉络较为清晰,甚至早在京师图书馆创立之初即产生了期刊馆藏建设的意识并初步建立了相应的采访政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外文期刊的馆藏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馆藏的逐步丰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外文期刊馆藏建设在民国时期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民国时期北平图书馆的馆舍与馆名均有诸多变化,因此,行文时,若相关数据在某一馆名存续时间范围内,则采用时称,若相关数据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馆名存续时间范围,则以在此40年中使用时间最长的馆名"国立北平图书馆"泛称之。

1 外文期刊馆藏建设的发展情况

1.1 期刊馆藏建设意识的产生(1912—1918)

对于期刊的收藏,京师图书馆初创之时已有予以重视的端倪,这在1912年京师图书馆呈教育部的报告中可见一斑,"(京师图书馆)略仿欧美通俗图书馆之制,除将馆内学者必须浏览之书分别择置外,再行添购各项杂志及新出书籍"[3](33-34)。1915年8月,京师图书馆分馆增设新闻杂志阅览室,搜集国内外新闻杂志;8月10日,教育部批文第1051号核准了"京师图书馆分馆新闻杂志阅览室规则"[1](44)。专设新闻杂志阅览室的做法应是京师图书馆产生期刊馆藏建设意识的一个重要标志。

据民国四年度(1915年)京师图书馆分馆工作报告显示[4](237-238),截至民国三年(1914年)底,分馆共收藏新闻杂志44种/64册,民国四年(1915年)又增77种/511册;虽然该统计并未对中外文期刊的品种和数量进行分类统计,但从民国六年(1917年)的年度报告中可以了解到,此时京师图书馆总馆已收藏日文杂志若干、分馆已收藏英文杂志10种[4](242-244)。

1.2 外文期刊采访政策的建立(1919—1928)

期刊等连续出版物的馆藏建设应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和完整性,这几乎是所有图书馆馆藏发展的一个共识。但对于民国初期的图书馆而言,能够意识到外文期刊对于国民的重要性已实属不易,更不必说拥有连续、系统、完整的期刊馆藏建设政策。早在1919年,京师图书馆便产生了广泛而系统地收藏外文期刊的思想和做法。1919年1月21日教育部指令第131号照准《拟变通捐助图书褒奖办法》及第132号照准《征集图书简章》[3](89-93),鼓励京师图书馆征集各界图书文献。这两个教育部指令是京师图书馆开始广泛而系统地收藏外文期刊的一个契机,京师图书馆同年即派馆员到其他图书馆参观学习。其中,京师图书馆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派去参观清华学校图书馆的馆员带回一本外文杂志通讯录(外国文杂志底本),该所据此给国内外出版社和学协会发送征集期刊的函件[4](277),努力扩充图书馆的外文期刊馆藏。

1926年,时北京图书馆在年报中就提出了"专门杂志尤必搜求全份不使零残"的重要原则,其中"最重要者如《英国考古学杂志》《亚里士多德学会研究录》《现代历史》……等,均以全帙购入焉"[5](11)。

1928年5月出版的《北京图书馆月刊》,在"本馆史略"中再次强调了外文期刊的采访原则,"本馆对于欧美专门杂志,力求完备,而能自第一卷第一号起,全份出让者,尤予以充分之注意。关于自然科学各书,即先从专门杂志入手,已有八十余种"[6]。而此时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数十种外文期刊中,已不乏《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s)等西文经典刊物。

1.3 外文期刊馆藏初建时的快速发展(1929—1937.6)

1929年11月28日,教育部指令第3066号,核准十四条《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其中第十二条规定期刊部下设中文期刊、西文期刊二组,并执掌期刊之采购事项[1](129)。另据民国十八年七月至民国十九年六月(1929年7月—1930年6

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记载"鉴于各馆藏书最感缺乏者为自然科学与整部之专门杂志,故年来对于此类书之搜集颇费辛勤,凡成套之期刊或丛刊均为一般购置中之最先事件。近三年来所得成套之专门期刊约一百五十种,皆自创刊号起至最近止"[7](14)。自此,国立北平图书馆不仅在建制而且在采访优先级别上对外文期刊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每年新增外文期刊均达几十种(见表1)。

表1 国立北平图书馆外文期刊年增量统计(1930—1935)[8](26-27),[9](10-12),[10](11),[11](8),[12](8)

年度	年增品种
1930年7月—1931年6月	22
1931年7月—1932年6月	40
1932年7月—1933年6月	30
1933年7月—1934年6月	58
1934年7月—1935年6月	25

至1935年6月,外文期刊连同旧藏共计达570种[12](8)。据1935年12月6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呈教育部解决重要图书南运经费办法"中记载,当时装箱的西文整部科学杂志已达116箱之多[3](428)。

1.4 抗战时期的努力与杰出表现(1937.7—1945.7)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国立北平图书馆除维持北平馆务外,还与临时大学合作办馆,并在长沙、上海、昆明、重庆、香港等地设立办事处[1](276-350)。其时,北平虽然沦陷,但在留守北平馆员的坚守下,国立北平图书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称"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外文期刊采访工作仍取得了较好成绩(详见表2)。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各地所设办事处则利用敌后条件,在外文期刊采访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其中,昆明办事处于1939年"订购之欧美专门期刊一千余种,咸能陆续寄滇,毫无间断,均分别陈列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3],1940年"订购之西文期刊已增至二千余种"[14];上海办事处于1938年订购外籍报纸,"美商华美晨晚报、中美日报,英商译报、导报、大英晚报及晨刊、循环报等寄滇"[3](645),又联系外国驻华使馆报社,"美国参赞赠与《中国贸易报告月刊》(*China Monthly Trade Report*, 1937-1939.),托德人Dr. Read征到《中国文化情报》13期及受赠《华美晨报》《大英夜报》《大○晚报》等报纸"[15];重庆办事处于1943年曾取得美国罗氏基金董事会四千五百美元的资助,采购最新制医学书报,寄存于贵阳、重庆、成都等地的医学机构[16]。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表2 1938—1944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外文期刊采访数量统计①[1](297-298, 356-357)

年度	订购品种	接受赠送	交换
1938年7月—1939年6月	185	109	12
1939年7月—1940年6月	156	125	—
1940年7月—1941年6月	112	125	24
1944年4月—1944年6月	44	76	—
1944年7月—1944年9月	83	65	—

1.5 战后外文期刊的续订与增订(1945.8—1949.1)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北平光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陆续回迁。为保证图书馆外文期刊的馆藏建设,国立北平图书馆多次报教育部筹拨特款恢复续订外文期刊。例如,1946年12月10日国立北平图书馆曾呈教育部"惟各国新出刊物日异月新,仍待购求者为数尚夥,只以外汇所限,未克积极进行。拟恳钧部特拨美金外汇壹万元,用资采购"[3](851-857)。1947年7月10日,时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又致函教育部,申请增拨经费[3](903)。

经过多方努力,及至1948年12月,馆藏"西文期刊……新增四百种,近在英美订购者约千种,尚未寄到……"[3](1269)。

① 1944年4—6月与1944年7—9月的采访数据源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接收"国立北京图书馆"时期的馆务报告内容,因无法获知期刊具体清单,无法对所统计品种去重合并,故按原文录于此表。

2 外文期刊的主要采访渠道

2.1 采购

采购从来都是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重要方式,这对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及其外文期刊采访工作而言也不例外。清末京师图书馆初创之时,购书经费由图书馆向学部报预算;中华民国建立后,购书经费改为图书馆向教育部请拨[3](23-25)。1924年中基会成立,自此至1945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大部分购书经费均由中基会资助[17]。1945年8月北平光复,10月,教育部接收"国立北京图书馆",恢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购书经费仍由教育部拨付。

自开始系统地收藏外文期刊,国立北平图书馆便对此项文献采访工作有了持续的经费投入。在有些年份,图书馆还会特批一笔经费,专门用于采购外文期刊。例如,1928年7月至1929年6月,时北平北海图书馆在采购了32种全份外文期刊的基础上,又在购书经费中特提出一部分购买了24种全份生物学杂志[18](11);1931年7月至1932年6月,又专门斥资4500美元购买外文杂志及年鉴,其中包括40种整部专门杂志[9](10-12)。

即使在北平沦陷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外文期刊采购方面的经费也仍未减少,订购量甚至不减反增。例如,档案记载,1938年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曾决定对西文科学期刊的续订购置费不予减少[3](550-551);另据昆明办事处统计,至1940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续订的西文期刊已增至2000余种,分送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云南大学及中日战事史料会陈列阅览[14]。

北平光复后,国立北平图书馆积极恢复馆务,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仍努力补购馆藏,并数次致函教育部要求专门拨付采购外文期刊的经费。至1948年底,馆藏西文期刊旧存1500余种①,日文期刊旧存500—600种,新增西文期刊400余种已到馆,另有近千种已订购外文期刊未到馆[3](1269)。

2.2 征集捐赠

国立北平图书馆外文期刊系统地接受捐赠始于时京师图书馆主动向各界的征集捐赠。自此,征集捐赠在民国时期外文期刊文献的馆藏建设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19年夏,京师图书馆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派员前赴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观一切,籍携资考镜,并携回该馆外国文杂志底本一册,当由本所通函美国各出版地并上海广学会等处。旋经纽约韦斯特图书馆及图书分馆复函,许可纷纷寄赠"[4](277)。至此,京师图书馆外文期刊征集捐赠工作得以正式开展。据《北京图书馆第一年度报告》[5](5-7)记载,1926年3月至1927年6月间,北京图书馆收到赠送外文期刊尤多,其中包括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刊《数学杂志》(1914—1926)、《工学报告》(1920—1925)、《科学报告》(1921—1926),《英国帝国学院院刊》(1905—1925),《瑞典国立历史古物学院院刊》(1907—1925),《美国纽约植物园园刊》(1896—1924)等。1927年7月至1928年6月间,北京图书馆"又赖金君溯初之美意,收得一八八五年以来《贝介学志》全部""以英伦叶滋氏之斡旋,收得一九〇三年以来《勃林顿美术杂志》全部"[19](13)。

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征集捐赠的外文期刊数量已达一定的规模。据国立北平图书馆各年度馆务报告记载,1931—1932年度受赠爪哇茂物(Buitenzorg)植物园赠《汇报》(1918—1930)全份、芬兰地理学会赠《芬尼亚》(*Fennia*)(1913—1930)与《地理学报》(*Acta Geographica*)(1927—1930)全份[1](227-228),1935—1936年度受赠西文期刊221种[20](3),1936—1937年度受赠杂志达800余种[21](2)。

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南迁。虽然图书馆的许多工作因此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但在图书馆同仁的努力下,征集捐赠工作仍在艰难地进行。1938年,美国卡内基科学院赠与国立北平图书馆该院刊物一份[1](321)。1939

① 该数字比1940年昆明办事处续订的2000种不增反减,估计与抗战时西文期刊馆藏分散陈列阅览有关。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之部)承中外人士及学术机关惠赠西文期刊386种[1](323)。1943年,教育部成立的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袁同礼为执行秘书)收到赠送的西文期刊210种[1](348)。1944年第一、二季度,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辖下"国立北京图书馆"分别受赠日文杂志76种、65种[1](356-357)。

2.3 交换

出版物国际交换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886年比利时、巴西、意大利、葡萄牙、塞尔维亚、西班牙和美国在比利时首都签订的《布鲁塞尔公约》。在公约的保护下签约各国之间的出版物交换日益频繁,同时也促使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

1925年8月6日,民国外交部在国务会议上议决加入《布鲁塞尔公约》,并设立出版品国际交换局,负责与各协约国的交换事务[22](604)。1926年4月2日,出版品国际交换局公函版字第231号,委托北京图书馆接收各缔约国交换到该局的政府出版品[3](1143-1144)。1927年,因经费不足,国际交换局将交换事务委托北京图书馆代为执行[23]。自此,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正式开展。同年,时北京图书馆即以交换办法获得《俄京科学院院刊》(1907—1926)与《德国学院院刊》(1900—1926)[19](13)。1929年,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又与俄国阿里克教授交换俄国出版之植物杂志[7](10)。到1936至1937年间,交换到馆的外文期刊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有128种之多[21](2)。之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及馆务南迁,交换业务同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并未间断,仍在艰难中发挥着作用。其中,1937至1938年度交换西文期刊12种,1940至1941年度交换西文期刊24种[1](297-298)。

3 外文期刊采访方针之"变"与"不变"

3.1 采访方针之变

3.1.1 重视程度之变

随着图书馆办馆理念及时代的发展,国立北平图书馆对外文期刊采访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清末建馆伊始,京师图书馆的藏书构成以清代学部藏书为基础,共分九大方面,包括内阁大库残帙、国子监与南学典籍、南陵徐氏及归安姚氏藏书、常熟瞿氏进呈书、敦煌石室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舆图与绢绫纱本、金石拓本[24]。在这九个方面中,无论是来自皇家官府旧藏还是来自民间私藏,均未提及外文文献,自然更不会提到外文期刊。

民国初年,京师图书馆已有众多拥有留洋或出洋考察经历的工作与管理人员,在馆藏建设方面已有仿照欧美图书馆的思想,并开始购买外文杂志及新出版的书籍。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步发展,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京师图书馆更加意识到外文期刊的重要性,开始广泛致函国内外出版机构与学协会,征集捐赠国外杂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国立北平图书馆逐渐确立了专门杂志力求完备、供给科学研究的原则,并多次将这些原则写入年报与办馆政策中[5-7]。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方诸高校及科研机构南迁,其所订期刊也多从1938年起停止续订。馆务南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各办事处则承担起了为诸高校及科研机构提供文献的责任,并将所订购外文期刊分发至各大学与机构陈列阅览。因此,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加提高了对外文期刊采访工作的重视程度。

3.1.2 学科侧重之变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初始收藏外文期刊时,学科方面并无侧重,1928年5月时共累积外文期刊80余种,人文社科类外文期刊至少为34种[6,25]。

为服务相关科研机构及其研究人员,国立北平图书馆采购的外文期刊逐渐向自然科学倾斜。例如,1928年7月至1929年6月北平北海图书馆曾专为静生生物调查所采购生物学杂志24种[18](11),193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订西文专门期刊(一千余种),以自然科学最多"[3](525-526)。

1939年1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昆明成立抗战史料室,开始大规模收集有关抗战方面的资料

与文献,原则为“采访之范围,不限于本国及中文书刊……其中包括欧、美、日本、苏联、南美各国出版物在内”[26]。从此,外文期刊采访工作又在抗战史料方面有所侧重。1939 年 1—4 月,共采访相关西文期刊 133 种、日文期刊 32 种;至 1944 年 9 月,采访的相关西文期刊已达 373 种、日文期刊 120 种[27]。

3.2 采访方针之不变

3.2.1 力求期刊完整性的原则不变

期刊的馆藏建设应具有完整性,如今这已是许多图书馆在连续出版物采访工作中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国立北平图书馆早在 1926 年就提出“专门杂志尤必搜求全份不使零残”的工作方针;1928 年又在《北京图书馆月刊》中提出“本馆对于欧美专门杂志,力求完备”的政策。国立北平图书馆外文期刊采访的原则不仅是这样写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样做的。如 1927 至 1928 年度增订的 41 种外文期刊均补购至创刊号[19](9-12),1932 至 1933 年度新增科学杂志 30 余种均为整部购置[10](11-16),1934 至 1935 年度新增 25 种科学杂志同样均为整部购置[12](8-14)。

馆务南迁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外文期刊采购仍能够坚持这一原则,如 1939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订购之欧美期刊一千余种,咸能陆续寄滇,毫无间断”[13]。不仅如此,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此期间呈报教育部的工作计划与工作报告中也均提出“西文专门杂志、年鉴、统计表等:此项定期刊物如中途停止,以后不易补购,亟需继续订购”[3](716-742)。

1945 年北平光复后,国立北平图书馆不仅人员短缺且经费拮据。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向教育部报告亟待解决的问题时仍不忘外文期刊完整采访的重要性,向教育部申请购书经费时特别提出“中西文学术期刊一项,尤须继续定购,以免中断”[3](866-869)。

3.2.2 服务科学研究的原则不变

1926 年,时北京图书馆成立管理机构,即北京图书馆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图书馆收藏学术资料的宗旨定为“辅助科学之研究”[5](5-7)。1928 至 1929 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又专为静生生物调查所订购 24 种全份生物学杂志,至此,外文期刊采访服务于科学研究的原则已初见端倪。1929 年,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在购书方面提出了两大政策“一为国家庋藏重籍之图书馆;二为供给科学(包括自然与人文科学)研究之图书馆……对于西文书籍,则特注重供给科学研究之方便,数年以后,即可为若干研究之中心……凡成套之期刊或丛刊均为一般购置中之最先事件”[7](5-14)。同年 11 月,经教育部核准,国立北平图书馆又成立了西文期刊组,专门负责西文期刊采购事项。自此,外文期刊的采访既有了以服务科学研究为原则的馆藏政策,又有了专门落实工作的组织机构。

1938 年,北方诸高校与科研机构南迁后,“从事科学研究之人既已全数离平……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所订之期刊自本年起均已停止续订”[3](525-526),馆务南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续订之西文学术期刊(除生物部分外)照原定办法继续存置临时大学;下一年度购置期刊费不加减少,均寄至临时大学,由本馆在彼职员整理典守”[3](550-551)。1940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原订购 2000 余种西文期刊的基础上“又增订欧美医学杂志 200 余种分寄成都、重庆、贵阳、昆明各医学机关,轮流参考”[14]。由此可见,即使在抗战维艰的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仍不忘坚持服务科学研究的原则。

4 外文期刊馆藏建设对图书馆界及学术界的作用与影响

自建馆至民国末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外文期刊馆藏建设经历了期刊馆藏建设意识的产生、订立外文期刊采访政策到大力发展外文期刊馆藏的过程。在这几十年中,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外文期刊采访工作并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而是站在北平地区乃至全国学界的角度开展工作。因此,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外文期刊馆藏建设不仅在共建共享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

为抗战时期全国学界的文献需求贡献了莫大的力量。

4.1 共建共享意识的萌芽与成绩

如今,我国各类型图书馆深受经费制约以及外文期刊高昂价格的影响,资源共建共享已经成为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早在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同仁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将共建共享的思想融入到采访工作中。1926 至 1927 年度《北京图书馆第一年度报告》中提到“至西文书方面,浩如烟海……本馆既调查京中各图书馆已有之专藏,尤注意其将来采购之方针,故力求通力合作,共为全部之筹划。如医药书既备于协和医学校,地质学书既备于地质调查所,政治经济书既备于政治学会者,不独本馆不复收藏,同时尤希望各馆于该特殊科学之资料,尽量补充,庶成一完备之专藏”[5](10)。1929 至 1930 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又专门针对西文文献提出“本馆以西文书价较昂而馆中购书预算又殊有限,故与北平各图书馆力求通力合作,籍以分途发展,而避免重复之工作”[7](14)。

此外,为更好地协调采访、实现文献共建共享,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曾宪三先生于 1932—1933 年间编制出版了《北平各图书馆西文期刊联合目录》[10](28)。1935—1936 年间,国立北平图书馆又编制出版了《馆藏西文期刊目录》[20](14)。

只是,笔者未查到 1937 至 1949 年间相关目录的编制出版或与资源共建共享相关的记载。或许是因为笔者能力所限,未能搜到相关资料;又或许是因为日军入侵与战后重建,许多图书馆的采访工作都十分艰难,外文期刊多已无法维持续订,更无暇顾及共建共享。

4.2 续(增)订外文期刊对战时学界的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沦陷区图书馆的设施及大量文献遭到了日军的破坏。例如,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在沦陷后被改作他用,大量书刊文献被损毁,复原时仅收回期刊合订本 2 万余册,损失在一半以上[28](444);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有 20 余万藏书未及时运走,落入日军及伪政府教育部之手[29](95);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在炮火中被损毁,损失图书文献达 22 万余册[30];当时全国高校图书馆中藏书最多的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在文献转移途中也损失了图书及杂志 20 余万册[31]。

虽然许多高校与科研机构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进行了南迁,但受战争影响,所转移文献有的在辗转迁徙途中受损,有的迁移到大后方后又遭到了日军战机的轰炸[32]。许多高校与科研机构所订购的外文期刊也多已停止续订,其研究人员所需研究资料无以为继。

业务南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意识到这一问题后,积极斡旋,利用各种条件续订甚至增订外文期刊,尽量满足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研究人员所需。1938 年 1 月 24 日,袁同礼在致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孙洪芬的信函中提到“本馆所订之专门期刊均可寄滇……此项刊物现为临大与中央研究院同人所需要,在战时对学术界之贡献上亦甚大”[3](484)。同年 2 月 8 日,袁同礼致函中基会董事,又提出“平馆所订之西文专门期刊,以自然科学为最多,刻下从事科学研究之人既已全数离平,似无再将此项刊物寄平之必要。而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所订之期刊,自本年起均已停止续订。倘本馆能将所订者暂存临大,实可救济学术界之恐慌”[3](525-526)。最终,中基会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达成决议,“续订之西文期刊除生物部分外,均暂存临时大学”[3](504-505)。

1940 年,为协助各大学发展,国立北平图书馆又将“馆藏之复本期刊及复本之西文书报,分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同济大学、私立大夏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师范学院等机关,以供参考”[1](316)。

1943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重庆办事处经美国罗氏基金董事会同意,用其资助的 4500 美元采购最新医学书报,供贵阳卫生署人员训练所、重庆国立上海医学院、成都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等医学

机关轮流借阅[16]。同年,袁同礼任国际学术资料供应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负责联络、接受和分配国外学术书刊胶卷,并“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将本年新出版之科学期刊,一律制成影片,用飞机运华……并在沙坪坝、成都、昆明、桂林设立图书影片阅览室……以供学术界之参考云”[33]。

对于战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期刊采访工作,1939年3月出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曾作如下评论:“该馆订购之欧美专门期刊一千余种,咸能陆续寄滇,毫无间断,均分别陈列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中能搜集如此完备之欧美期刊,似以该馆为嚆矢”[13]。

抗战时期,虽然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购书经费也不充足,但毕竟有教育部、中基会的拨款与资助,其资金比同时期其他图书馆相对充裕。在袁同礼等诸位先生的努力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在采购、征集捐赠、交换等渠道的采访工作上也有着很大的成绩。由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所采访的外文期刊均侧重于专业领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界的文献需求困境,对当时学界的研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5 结语

自建馆初期至民国末期,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外文期刊的品种从无到有,再到两千余种。品种虽不浩博,数量虽不宏富,但它不仅是当时图书馆馆藏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馆藏建设、辅助学界研究的重要资料。国立北平图书馆前辈们的工作方法、采访途径、采访方针,不仅有许多一直沿用至今,甚至在那个通讯十分不便、经费异常拮据的年代,他们的许多工作做得比今天更加细致、更具主动性,收效更好。例如,在征集捐赠方面,他们充分利用了外文杂志通讯录,主动向国内外出版社和学协会发送征集捐赠的信函,从而陆续获取了大量寄赠的外文期刊;在战争纷乱的年代,在社会各界仁人志士的大力支持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收集国内所需外文期刊,为学界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辅助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教育与科研,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认可。国立北平图书馆前辈们这种“不遗余力的搜采精神”[34]既值得今天的图书馆人景仰,更值得今天的图书馆人去传承。

参考文献

1 李致忠.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上)[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2 邵文杰. 九十年来外文文献的采访[J]. 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3):3-10.

3 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4 李希泌, 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5 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第一年度报告(缩微品):民国十五年三月至十六年六月[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2005.

6 本馆史略[J]. 北京图书馆月刊, 1928(1):1-6.

7 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缩微品):民国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六月[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2005.

8 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缩微品):民国十九年七月至二十年六月[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2005.

9 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缩微品):民国二十年七月至二十一年六月[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2005.

10 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缩微品):民国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二年六月[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2005.

11 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缩微品):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

六月[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5.
12 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缩微品)：民国二十三年七月至二十四年六月[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8.
13 国立北平图书馆近讯[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5)：24-25.
14 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近况[J]. 图书季刊，1940(2)：262-264.
15 图书馆学通讯资料组. 抗日史料征辑工作拾零[J]. 图书馆学通讯，1982(3)：50-51.
16 国立北平图书馆协助医学中心点获到最新之医学书报[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3(3/4)：4-5.
17 张书美，刘劲松. 中基会对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历史贡献[J]. 图书馆，2009(5)：46-48.
18 北平北海图书馆. 北平北海图书馆第三年度报告[M]. 北平：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
19 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第二年度报告(缩微品)：民国十六年七月至十七年六月[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5.
20 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缩微品)：民国二十四年七月至二十五年六月[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8.
21 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缩微品)：民国二十五年七月至二十六年六月[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6.
22 吴永贵. 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第十五册)[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23 杨士丽，张玮. 国家图书馆出版物交换业务的历史沿革与发展[J]. 图书馆学刊，2016(10)：1-5，44.
24 李镇铭. 京师图书馆的基础藏书及其渊源[J]. 北京图书馆馆刊，1995(3/4)：113-116.
25 主要西文杂志目[J]. 北京图书馆月刊，1928(1)：11-13.
26 戚志芬. 袁同礼先生与中日战争史料征辑会[J]. 北京图书馆通讯，1989(1)：58-62，70.
27 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近况[J]. 图书季刊，1944(2/3)：111.
28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 清华大学校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29 吴楫. 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0 黄颖.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破坏与掠夺——为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而作[J]. 津图学刊，1995(3)：1-5.
31 黎洁华. 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大学图书馆遭劫记[J]. 广东党史，2006(6)：46-50.
32 陈剑光，周文芳. 抗战期间中国高校图书馆之损失[J]. 浙江社会科学，2002(1)：162-164，176.
33 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正式成立[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3(3/4)：5.
34 李致忠. 百年传承的国图精神[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08(2)：8-14，26.

(齐东峰　张　玮　副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

收稿日期：2018-05-29